

孫中山書信手稿選



刘大年主编

孫中山書信手迹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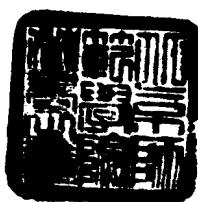
屈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3847



1093847

孫中山書信手述選

主編：劉人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印刷者：新华彩印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四元二角

787×1092 1/16 印张：13.5
统一书号：11068·1516

责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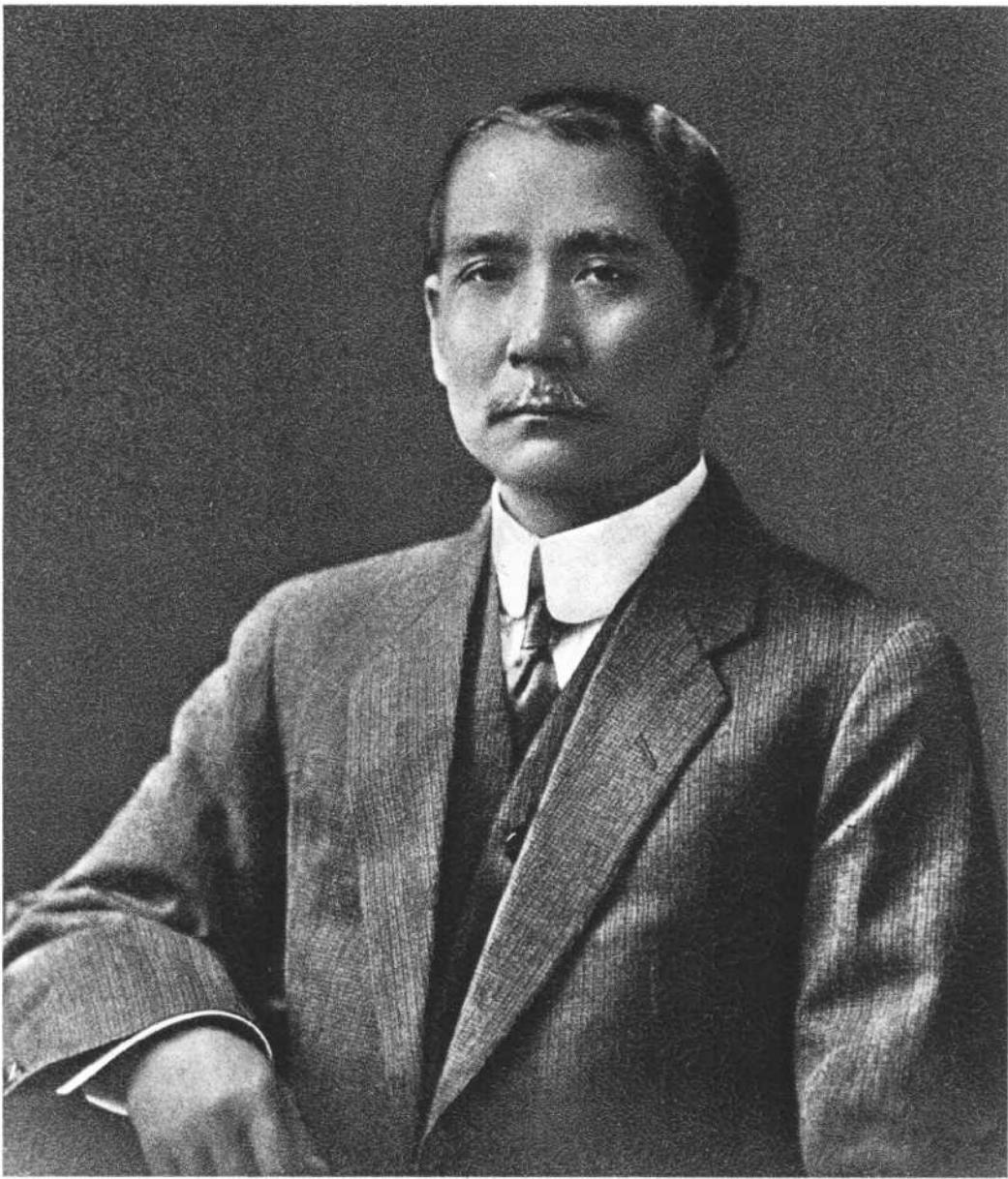
盛永华

张广然

仇德虎

装帧

仇德虎



目
录

一	序	
二	致翟理斯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九
三	致官崎寅藏（滔天）	一八九九年三月二日.....一七
四	致官崎寅藏	一八九九年四月一日.....一八
五	致犬养毅（木堂）	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一九
六	致平山周等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二〇
七	致平山周	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二一
八	致犬养毅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九日.....二二
九	致平山周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二三
一〇	致黄宗仰（中央）	一九〇二年七月三十日.....二四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五
		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六
		一九〇四年五月.....二七
		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八

一一	致黄宗仰	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	三〇
一二	致官崎寅藏	一九〇五年六月四日	三三
一三	致官崎寅藏	一九〇九年三月二日	三四
一四	致王鸿猷（子匡）	一九〇九年七月上中旬	三八
一五	致王鸿猷	一九〇九年七月十七日	四〇
一六	致王鸿猷	一九〇九年十月八日	四一
一七	致王鸿猷	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四五
一八	致布鲁塞尔同志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五三
一九	致比利时同志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五五
二〇	致王鸿猷	一九一〇年一月四日	五七
二一	致王鸿猷	一九一〇年三月三十日	五九
二二	致庄文亚	一九一〇年七月月中旬	六〇
二三	致官崎寅藏萱野长知	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日	六一
二四	致官崎寅藏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六三
二五	致官崎寅藏	一九一一年四月一日	六五
二六	致官崎寅藏		

二七	致加拿大某埠同志	一九一一年四月六日	六六
二八	致宫崎寅藏	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六七
二九	致宗方小太郎	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六九
三〇	致宫崎寅藏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二日	七五
三一	致希炉同志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七八
三二	致王鸿猷	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	八〇
三三	致王鸿猷	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	八一
三四	致江俊孙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八二
三五	致黄兴（克强）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八六
三六	致黄兴	一九一四年六月三日	一〇〇
三七	致黄芸苏（魂苏）	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〇五
三八	致宫崎寅藏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〇七
三九	致徐谦（季龙）林森（子超）胡汉民	一九一四年一月六日	一〇八
四〇	致李绮庵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一一〇
四一	致陈永惠	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	一一〇
四二	致朱执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四日	一一一

四三	致叶恭绰（誉虎）	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	一一二
四四	致孔庚（雯掀）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一一三
四五	致蒋中正（介石）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一五
四六	致蒋中正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六
四七	致蒋中正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七
四八	致廖湘芸	一九二三年五月	一九
四九	致胡汉民（展堂）杨庶堪（沧白）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	一二一
五〇	致杨庶堪	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	一二四
五一	致廖湘芸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一二五
五二	致胡汉民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二六
五三	致胡汉民杨庶堪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一二九
五四	致邓演达（泽〔择〕生）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三一
五五	致胡汉民等	一九二三年八月四日	一三四
五六	致杨庶堪	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	一三五
五七	致胡汉民杨庶堪	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	一三九
五八	致杨庶堪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	一四〇

五九	致杨庶堪	一九二三年九月四日	一四二
六〇	致犬养毅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四六
六一	致许崇智(汝为)杨希闵(绍基)刘震寰(显丞)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七〇
六二	致张作霖(雨亭)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七一
六三	致胡汉民杨庶堪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一七四
六四	致廖仲恺	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	一七五
六五	致汪精卫胡汉民	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	一七六
六六	致范石生(小泉)廖行超(品卓)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七七
六七	致范石生廖行超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八〇
六八	致范石生廖行超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八三
六九	致胡汉民廖仲恺*	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	一八五
七〇	致蒋中正	一九二四年九月九日	一八六
七一	致陈青云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一八九
七二	致蒋中正**	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	一九一
七三	致廖行超	一九二四年十月	一九五
七四	致范石生廖行超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一九八

序

江山多娇，人物代起。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临到一百二十周年了。中国学术界决定出版一系列有关文献和著作，来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是这些出版物中的一种。它不是用其他资料和研究者的论述、分析，来表现孙中山的思想、活动等等，而是由他本人的亲笔书信对许多问题直接提供说明，更显得亲切而有意义。从文物角度看，这些书信手迹十分珍贵，自不待言。双重的作用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觉得编印这样一本书来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是可取的，能以填补一项空缺。

孙中山手迹编辑成书，最早见于一九二七年。从那以后，屡有刊行。现在我们能够找到的，有邓泽如辑《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四卷本，一九二七年广州述志公司印行），张人杰题《孙中山先生墨迹》、《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各一册，内容相同，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民公司出版），李烈钧辑、谭延闿跋《孙大元帅手令》（一函二册，一九二八年印行），佚名编《总理遗墨第一辑》（约一九二九年出版），《总理遗墨第二辑》（约一九三〇年出版），《总理遗墨第三辑》（出版时间不详），谭延闿辑《总理手札（二十三通）》（一九三〇年出版），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四辑（一九三〇年上海民智书局影印版），黄警顽编《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一九三三年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版），张

水福编著《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中华书局版），叶恭绰编《总理遗墨》（一九三四年出版，一九六〇年手跋），佚名编《总理遗墨》（出版时间不详），郭镇华编《国父墨宝》（一九四八年北平北方杂志社版），罗家伦编《总理批牍墨迹》（一九五五年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国民党史编纂委员会编《国父墨迹》（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台北版）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国父建党革命八十周年纪念册》（共二册，一九七五年台北版）等，不下二十种。它们总共刊印、保留了孙中山的文稿、函电、批牍、题签等五、六百件，搜罗甚富，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那些出版物多数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有的取材唯我所需，纯为某人作政治宣传；有的名曰「手札」，却辑入只有本人签名的「代笔」，名实不符；有的仅就已刊版本改头换面，作为新书印出，《手札二十三通》就刊印过三、四种本子。大多数版本互相重复，新东西寥寥可数。剔去重复的，那些出版物上，孙中山的亲笔书信总共为一百五十件左右。过去成书的情况，大致如此。

《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和以往那些《遗墨》《手迹》不同。顾名思义，其入选的前提是书信，而且必须是亲笔。鉴于目前已知和新发现的孙中山亲笔书信，不计入写着「函电两发」的，也在三百一十件以上，本书选录的原则是：（一）文字及手迹从未刊行；（二）文字发表过，手迹没有刊行的；（三）手迹刊行过，散见于国内外出版物上，流传未广的；（四）旧中国印行过，但有重要研究价值或受信人有代表性的。它们的比例是：（一）、（二）两项共占百分之七十六，（三）项占百分之十九，（四）项只占百分之五。因此这本书信手迹选，无论从内容看或从文物看，都具有显著的特色。历史研究者可以

从这里找到学术价值甚高的史料，文物、书法鉴赏家也可以从这里一睹向未面世的文物，赏心悦目。

自然，这个手迹选并没有包括新近发现的孙中山亲笔书信的全部。如先后见于书刊的给蔡元培、章太炎、周震麟、孙科、盛宣怀、赵凤昌、周善培、罗翼群等人的信，以及台湾《国父全集》篇末所注根据《亲笔函件》付印的三十几封书信，或者找不到原件，或者原件破损难于印制，都没有能够编选在这里面。一些已知的给外国人士的某些信是否亲笔，现在无法查对，也就谈不到入选的问题。

关于这本《孙中山书信手迹选》的学术价值，我想稍稍说得具体一点。它收集信札七十四件。其时间始于一八九六年，止于一九二四年，以辛亥革命、国共合作为中心的两个光辉时期都显示在里面了。受信人多达三十七名。他们中间，或为支持革命的普通群众，或为影响显著的领导人物，或为始终与孙中山密切合作，勇敢献身的革命家，或为一时「革命」，阴谋夺取权力的野心分子；他们中间也有官僚，也有军阀，也有宫崎滔天那样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也有犬养毅一类与日本侵略势力直接联系的政客。信中涉及许多历史事件，许多对内对外的斗争。其中给黄宗仰、王鸿猷、宗方小太郎、黄兴、黄芸苏、徐谦、蒋介石、廖仲恺等人的信，讲的事情更多些。一九二三年给犬养毅的长信，内容尤其丰富，与台湾发表的文字有些差异，是一个以前少为人知的底稿。对它们客观地、仔细地加以利用，很有益于学术研究，当无疑义。

孙中山在历史舞台上活动了凡四十年，著述不少，广有交游。单凭这些有限的亲笔书信，当然

不能够充分表现出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全部革命斗争的生涯。书信中谈到的某些人和事，也还需要加进其他材料去了解、论证。但是这些书信还是足以使人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位杰出人物产生出一个鲜明的印象。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一生关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辛亥革命以前，多次起义遭到镇压，反袁斗争、反对陈炯明叛乱和反对曹锟、吴佩孚等北洋军阀的斗争，军事上屡遭挫折、失败。其他一些人徬徨动摇，孙中山总是从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前景。例如一九〇九年给宫崎滔天的信上说：防城、南关、河口三次起事，都没有达到目的。准备暂时养回元气，以图再发。清廷帝、后丧亡，各省人心大变，无不跃跃欲动，有不可终日之势。准备革命党人一旦筹集到必要的财力，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一九一一年广州起义，即牺牲惨烈的黄花岗一役以后，他在写给宗方小太郎的信上说：广东虽败，幸无大伤，而其影响于中国人心，实在非常之大，虽败犹胜。再待数年，军心民气皆可成熟，必能学步葡萄牙革命之伟烈。坚信革命必胜的精神，信中随处可见。国内外的研究者中，对于孙中山的杰出表现在哪里，其说不一。一种看法，认为在于他取得了伟大成功；另一种看法以为事情恰恰相反，是在于他虽然屡遭失败，仍然坚持革命，奋进不息。后面的看法明显较为接近实际，也合乎孙中山自己认为「革命尚未成功」的认识。

凡称得上大革命家的人，总是善于辨认历史潮流，勇敢地跟着时代前进的。孙中山的这种品质也表现得相当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对世界局势，对中国革命前

途的认识，不久就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游说大养毅的长信里，他反复叙述，欧战以后，世界大势已为之一变。强盛如英国，加上战胜的余烈，也不得不承认爱尔兰、埃及、印度等有权独立、自由。欧洲被压迫的人民已经觉醒起来了。「夫赤露者，欧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也」。亚洲人民受压迫比欧洲更甚，要求解放更为迫切。日本不改变其「步武欧化帝国主义之后尘」虎视亚洲、侵略中国的政策，亚洲人民只有把希望和目标转向革命的俄国，别无选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是他把《礼运篇》上讲的大同世界，和俄国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直接地联系起来，加以申述。他引用《礼运篇》上关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一整段话以后，断然地说：「露国之立国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有何可畏！」据考证，《礼运篇》大约为秦汉间人所撰，它反映封建社会里人们要求摆脱阶级剥削压迫的愿望，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隔几个时代。孙中山以往多年为中国革命奋斗，采取的理论是欧美资产阶级理论，向往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如今，当他看到现实世界中，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后，就结合中国传统，开始赞美、向往这种「天下为公」的新制度，一往情深。不管那种申述怎么不合乎科学理论，思想上巨大而又迅速的前进十足引人注目。《礼运篇》不止他讲过，在他以前康有为也讲过。康有为先写《礼运注》，然后又写成《大同书》发挥公羊三世说，阐述自己的理想社会是太平世，以为现在的欧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升平世，并接近太平世，真正的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则要等到千万年后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无实现之日。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并且美化资本主义。孙中山则认为俄国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

压迫制度，便是走向大同世界的道路。他们两人都讲《礼运篇》，联系的现实世界根本不同。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给蒋介石的信坚决地指出：「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从上述给犬养毅的信可以知道，这是他放眼观察世界，结合中国实际，长时间深思熟虑，然后作出的历史性决断。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与这个决断并不协调，是显而易见的。但事情是变化发展的。中国革命「以俄为师」，是孙中山思想认识发展的最为光辉宝贵篇章。台湾和海外有些历史撰述，讲到「联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极力解说为是孙中山出于一时利害，采取的所谓「策略」。那样一来，孙中山一生思想事业先进伟大的重要部分，就被当做坏东西抛弃了。

阅读这些亲笔书信，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的一面。其中讲到辛亥革命推倒清政权，似乎出于意外，他把眼光局限于自己领导的革命党人活动上，而不理解广大群众斗争的力量。辛亥革命后，谈到三民主义的时候，也不只一次地强调民权民生两主义还没有实现，似乎民族独立已经不是重要问题。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对日本一些侵略分子长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希望日本当权势力支持中国革命，承认苏俄政权，成为亚洲的救主。如此等等，都是很明显的。可贵的是到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反帝思想终于完全明确起来了。我们不应当片面夸张事实，也不应当讳言掩饰，无视局限性的这一面。

中国有种说法：文如其人或书如其人。科学地研究历史人物，需要说明他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和时代特征。唯有这样，人物研究才真正构成科学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物又总是有血

有肉，有自己的文化素养、处事方式、不同性格的。孙中山这些亲笔书信的学术价值，也在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文化背景、风度、性格等等。他长期受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熏陶，熟悉西方生活，而且还曾经是悬壶问世的合格西医。最初梁启超描述他的面貌是陈胜、吴广一流，即农民造反者。章太炎根据自己的接触，说他「无他犷状」。后来反对他的人，轻蔑地称之为「孙大炮」，意思是说大话，无实际，牛皮客，空谈家。毛泽东说，听过孙中山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黄季陆说，孙中山讲话声音并不大，却清晰明朗。从现存的两小段录音带听到他讲话，极其斯文。这些亲笔书信所表现的，却是一个熟谙中国文化传统，重视讲求实际，遇事从容沉着，富有坚韧不拔精神的人物形象。表面上不同性格、风度的结合，或者就是近代中国这个特殊过渡时代的过渡性历史代表人物的性格、风度的特点。

研究孙中山和他的时代，是一项长期的学术工作，搜集有关的资料文物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美籍华人林文光先生不远万里，携回孙中山《致希炉同志函》原件等珍贵文物，慷慨赠送给孙中山研究学会。林先生的父亲林智早年居住夏威夷，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生前一直珍藏着这些文物，并叮嘱子女，一定要将它们妥善送回祖国。崇高的感情，令人至为钦敬。这个事例说明，大陆、台湾和国外的孙中山关系人或其后裔、学术研究者、文物收藏家或收藏机构，还完全可能保存着同类珍贵资料、文物，有待去发掘整理。因此，我们希望与有关人士、台湾以及海外的同行，进行研究交流，以期在不远的将来，编印出一部更完备的孙中山书